

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分布图谱：检视与省思

李威 岳涛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国学教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其机构化发展已成为普遍现象。基于全国性调研数据与公开资料，运用空间分析与类型学方法，系统绘制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分布图谱。研究发现，机构分布呈现出“东密西疏、中心 - 边缘”的不均衡特征，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积淀及政策支持力度呈正相关。从类型上看，市场化培训机构占比最高，公立学校附属国学班与公益性书院相对较少，在课程设置、师资构成与运营模式上亦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视表明，当前国学教育机构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着商业化过度、内容阐释碎片化、师资专业性不足、评价体系缺失等现实困境。对此提出，从健全资质监管体系、规范课程内容建设、提升师资专业素养、规范营销传播行为、构建多元评价体系等方面着手，促进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学；教育机构；分布图谱；可持续发展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3.670>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国学是中华文明延续和传承的重要依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其内涵逐渐演变为以儒学为主体，兼及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文化，以及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传统艺术与典籍的总称。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文化自信战略的推进，“国学热”持续升温，从民间自发的读经活动到官方主导的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国学正以多种形式重新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国学及国学教育是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力量之基。^[1]其中，国学教育机构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教育的重要纽带，凭借其灵活的办学模式与

作者简介：李威（1985-），男，湖北蕲春人，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黄冈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岳涛（1988-），男，湖北十堰人，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国学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发展困境与治理策略”（编号：20Q144）。

多样化的课程供给,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发展历程来看,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兴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为萌芽期,主要以民间小规模读经班、书院为代表,参与者多为对传统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家长与儿童,带有较强的自发性与实验性;2005年至2015年为快速发展期,随着《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强调,以及媒体对国学教育的积极宣传,市场化的国学培训机构开始大量涌现,办学规模与影响力不断扩大;2017年以来,伴随《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国学教育被正式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机构发展进入规范化、体系化探索期,公立学校、社会组织与企业等多元主体开始深度参与,形成了公办与民办并存、营利与非营利共生的多元格局。

然而,在国学教育机构数量激增、规模扩张的背后,其发展现状与质量却亟待深入检视。一方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学教育的价值阐释^{[2][3]}、课程设计^{[4][5]}或单一机构的个案分析^{[6][7][8]},缺乏对全国范围内机构分布特征的系统性考察,难以清晰呈现其空间布局的整体图景;另一方面,针对机构运营中的具体问题开展研究^{[9][10]},但在商业化倾向与文化传承使命的冲突、师资队伍专业资质参差不齐、课程内容选择与阐释缺乏统一标准等,尚未形成全面、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基于此,本文以“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分布图谱”为核心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当前我国国学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何种特征?其分布差异是否与区域经济、文化、政策等因素存在关联?二是不同类型的国学教育机构在办学定位、课程设置与运营模式上存在哪些差异?三是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困境?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实践创新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采用以下研究方法:其一,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国学教育、传统文化传承及教育机构发展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其二,问卷调查法与实地访谈法,通过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学教育机构发放问卷,并选取典型机构进行实地走访,收集机构分布、课程设置、师资构成、运营状况等一手数据;其三,空间分析法,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工具,将调研获取的机构坐标数据与区域经济、文化等统计数据叠加分析,直观呈现其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其四,类型学分析法,根据办学主体、资金来源、办学目标等标准,对国学教育机构进行分类,并比较不同类型机构的发展差异。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理论层面,通过构建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分布图谱,填补了现有研究在空间维度与宏观视野上的不足,丰富关于传统文化教育载体的学术研究;实践层面,通过深入检视机构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可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国学教育机构的规范化运营与质量提升提供实践指导,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

二、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分布特征分析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章数据来源于两项核心调查:一是课题组2020年3月至2025年3月开展的全国国学教育机构专项调研,通过分层抽样法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68家机构进行问卷发放与回收,有效回收率达82.3%,涵盖市场化培训机构、公立学校附属国学班、公益性书院等主要类型;二是整合市场监管部门公开的国学类经营主体注册数据、教育部门传统文化教育机构备案信息及主流在线教育平台的机构入驻数据,形成包含2.3万余家机构基本信息的数据库,经去重与有效性校验后,最终保留有效样本1.8万余家,为本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本文采用“宏观空间格局+微观类型差异”的双重分析框架,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解读展开研究。

宏观层面运用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通过核密度估计与热点分析，呈现机构空间集聚特征；中观层面以省份和城市等级为单元，计算区位熵与分布不均衡指数，量化地域差异程度；微观层面结合交叉分析，探究不同类型机构的分布规律。同时引入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机构分布与经济、文化、政策等变量的关联强度，为影响因素解析提供量化依据。

2. 空间分布的核心特征

第一，宏观格局：东密西疏的梯度差异。全国国学教育机构呈现显著的“东强西弱”空间格局，形成三级梯度分布带（见图 1）。第一梯度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为核心，机构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47.2%，核密度值普遍超过 15 家 / 千平方公里，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地区形成三大高密度集聚区，仅上海市机构数量就达 1832 家，占全国的 10.2%。第二梯度为中部省份，包括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等，机构数量占比 31.5%，核密度值介于 5-15 家 / 千平方公里，形成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点状集聚，如武汉、成都的机构数量均突破 800 家。第三梯度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如西藏、青海、宁夏等省份，机构数量占比仅 21.3%，核密度值多低于 5 家 / 千平方公里，且主要集中于省会城市，广大县域地区机构覆盖率不足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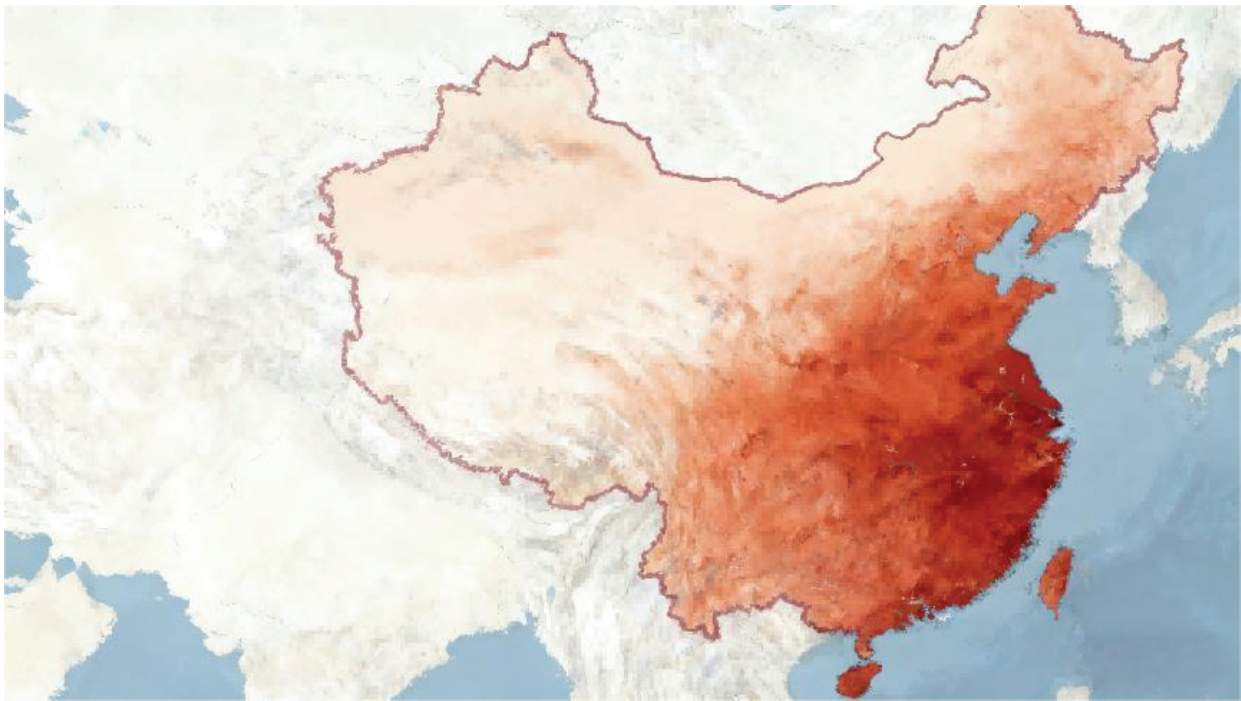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注：图中颜色由浅至深代表核密度值递增，反映机构集聚程度。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及部分中西部省会，低值区主要分布于西部偏远地区。）

第二，中观尺度：中心 - 边缘的集聚效应。以城市等级为视角，机构分布呈现强烈的“中心 - 边缘”集聚特征（见表 1）。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占全国 1.2%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19.8% 的国学教育机构，平均每万人拥有机构数量达 0.87 家；新一线城市机构数量占比 32.5%，每万人拥有量为 0.52 家；二线城市占比 26.3%，每万人拥有量 0.31 家。而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农村地区，虽覆盖全国 90% 以上的人口，机构数量占比仅为 21.4%，每万人拥有量不足 0.1 家，且多以小型培训机构为主。这种集聚效应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如长三角地区的上海、苏州、杭州构成“核心三角”，机构数量占区域总量的 58.6%，而周边县域机构密度仅为核心城市的 1/6。

表 1 不同等级城市国学教育机构分布情况

城市等级	机构数量（家）	占比（%）	每万人拥有量（家）
一线城市	3564	19.8	0.87
新一线城市	5850	32.5	0.52
二线城市	4734	26.3	0.31
三线及以下城市	3852	21.4	0.09

第三，类型差异：多元主体的分布分异。不同类型国学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分异特征。市场化培训机构作为绝对主体（占比 72.3%），高度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一线城市占比达 24.5%，新一线城市占比 38.7%，其分布与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系数达 0.78，充分体现市场驱动特征。公立学校附属国学班（占比 15.6%）则呈现“政策导向型”分布，在教育政策落实力度大的省份更为集中，如山东、河南等传统文化大省，此类机构占比均超过 20%，且在城乡分布上相对均衡。公益性书院（占比 12.1%）多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如山东曲阜、河南洛阳等文化名城，书院数量占全国同类机构的 31.2%，且多与当地博物馆、文化馆形成联动发展格局。

3. 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解析

第一，经济基础：市场需求的核心驱动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机构分布的首要因素。相关分析显示，地区 GDP 总量与国学教育机构数量的相关系数为 0.82，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机构密度的相关系数达 0.85，表明经济实力直接决定市场需求容量。在一线城市及东部发达地区，家庭年均教育支出普遍超过 3 万元，其中传统文化教育投入占比达 15%–20%，旺盛的付费需求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催生了多元化的机构形态，从高端国学总裁班到普惠性少儿读经班均有覆盖。而西部欠发达地区，家庭教育支出有限，传统文化教育投入占比不足 5%，市场需求难以支撑机构规模化发展，导致机构数量稀少且类型单一。

第二，文化积淀：历史传承的空间载体。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构成机构分布的重要支撑。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省份，国学教育机构密度平均为 4.2 家 / 百万人，是其他省份的 2.3 倍。山东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依托曲阜三孔等文化资源，培育了包括曲阜圣贤学校在内的千余家国学机构，形成“文化资源 – 教育机构 – 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河南、陕西等古都集中省份，凭借丰富的历史遗存，推动国学教育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书院、国学馆等机构多选址于文化景区周边，既获得文化氛围支撑，又实现运营效益提升。反之，历史文化资源匮乏的地区，国学教育缺乏具象化载体，机构发展往往缺乏特色与吸引力，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第三，政策支持：制度环境的导向作用。国家与地方政策对机构分布具有显著引导作用。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出台后，各地政策响应力度差异直接导致机构发展分化。在政策配套完善的省份，如北京、江苏，不仅将国学教育纳入中小学考核体系，还设立专项补贴支持社会机构发展，仅北京市就累计投入 2.3 亿元扶持资金，催生了善品堂等一批知名机构。这些地区的机构数量年均增长率达 28.3%，远高于全国 15.6% 的平均水平。而政策落实滞后的地区，缺乏明确的发展规划与资金支持，社会资本投入意愿不强，机构发展多依赖民间自发推动，规模与质量均受限制。

第四，技术进步：线上线下的空间重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机构分布格局。在线教育平台突破了地理空间限制，使西部偏远地区能够通过线上渠道获取国学教育资源，目前全国 38.7% 的国学教育机构已开通线上课程，其中 70% 的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推动线上机构向教育资源薄弱地区渗透，形成“线下机构集聚于东部，线上服务覆盖全国”的新格局。但技术赋能仍存在不均衡性，东部地区线上机构的课程研发投入是西部的 3.5 倍，优质线上资源仍主要集

中于发达地区，数字鸿沟尚未完全消除。

总之，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布呈现“东密西疏、中心集聚、类型分异”的核心特征，形成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核心、中西部省会城市为节点、线上服务为补充的空间格局。这一格局是经济基础、文化积淀、政策支持与技术进步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决定市场需求容量，文化资源提供发展底蕴，政策支持营造制度环境，技术进步拓展服务边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布格局既体现了国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也暴露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西部及农村地区的国学教育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未来国学教育机构的健康发展，既要尊重市场规律与文化遗产逻辑，也要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赋能，推动资源向薄弱地区倾斜，实现从“集聚发展”向“均衡优质”的转型。

三、机构类型与运营模式比较

国学教育机构类型多样，主要包括传统国学培训机构、在线国学教育平台、综合教育培训机构等，不同类型的国学教育机构存在不同特点与差异。

1. 传统国学培训机构

第一，教学模式。以线下实体教学为主，注重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与知识传授，能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部分机构还会开展实践教学，如传统礼仪研习、书院游学等，增强学员的体验感与文化认同感。课程设置：课程体系较为传统和系统，以儒家、道家经典研读为核心，如《四书》《五经》等。同时，搭配书法、古琴、茶道等国艺修习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有分层课程，如蒙学教育以《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成人教育则侧重经典深度解读。师资力量：师资多为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学者、专家或传统文化爱好者，专业知识扎实，教学经验丰富，可提供深入讲解，但在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方面可能有所欠缺。运营特点：有固定教学场所，运营成本较高。市场份额占比较大，约为40%，靠长期口碑与品牌建设吸引学员，品牌知名度提升较慢。

如北京观复博物馆/观复学堂专注于传统文化教育，其定制化书院游学项目，单客单价达2.8万元，通过带领学员前往历史文化古迹等地，让学员在实地体验中深入学习国学知识。上海秦汉胡同“国学”书院则以线下门店为依托，开展丰富的国学课程，其开发的AR书法临摹系统，借助微软Hololens技术实现虚拟碑帖的立体化呈现，使学员运笔准确率提升40%，该教学模型已获三项国家专利。

2. 在线国学教育平台

第一，教学模式。采用线上教学，以“直播授课+录播学习”为主，方便学员随时随地学习，突破时空限制。部分平台借助AI技术，如AI书法临摹系统等，提升教学的趣味性与互动性。第二，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涵盖诗词、书法、礼仪等多个领域，更新速度快，能及时满足市场需求与学员兴趣变化，并可根据学习数据进行个性化课程推荐。第三，师资力量。师资来源广泛，有专业国学教师、知名学者等，但水平可能参差不齐，需平台加强筛选与管理。第四，运营特点。运营成本主要在平台建设、课程研发和线上推广，相对较低。发展速度快，市场份额占比约为30%，能通过互联网迅速扩大用户群体，但用户忠诚度和复购率受课程质量和服务水平影响较大。

如“学堂在线”是专注于线上国学教育的先锋，自2013年创立以来，拥有超过百万注册用户，其课程涵盖诗词、书法、礼仪等多方面，以“直播授课+录播学习”模式为核心，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腾讯课堂作为腾讯旗下教育平台，采取“内容聚合+自研课程”策略，引入头部机构课程并自主开发特色国学课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等不同阶段学习需求，用户活跃度和付费转化率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3. 综合教育培训机构

第一，教学模式。多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将传统线下授课与线上学习平台相结合，发挥

两者优势，提供更灵活便捷的学习体验。第二，课程设置。国学课程是其多元化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常与其他学科或培训项目结合，如英语培训、K12 学科辅导等，注重知识的综合性和实用性。第三，师资力量。拥有丰富师资资源，包括国学领域专业教师和其他学科优秀教师，可提供跨学科知识讲解，但国学课程师资的专业性可能相对较弱。第四，运营特点。品牌知名度和学员信任度较高，能利用品牌优势和市场渠道迅速推广国学课程，市场份额占比约为 20%，但因国学课程非核心业务，投入资源有限。

如新东方以英语培训闻名，近年来积极布局国学培训市场，将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其国学课程涵盖文学、历史、文化等方面，邀请众多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导师，注重知识传授和实际应用相结合。TAL 教育以 K12 学科辅导为核心业务，通过收购优质机构和自主开发课程的方式涉足国学培训领域，其国学课程涵盖古诗词、书法、礼仪等方面，并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在城市中高端群体中具有较高用户认可度。

4. 国学研究机构

第一，教学模式。主要开展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较少直接面向社会开展大规模国学培训教学，但会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研讨会等形式传播国学知识。第二，课程设置。以国学学术研究为主，课程内容侧重于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古籍整理、学术传承等，如对儒家经典的哲学思想研究、道家文化的历史演变研究等。第三，师资力量。师资多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专业学者、专家，他们在国学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研究经验。第四，运营特点。运营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科研经费、社会捐赠或机构自身的科研项目收入等，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更注重学术成果的产出和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

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作为国内知名的国学研究机构，汇聚了众多国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专注于国学基础理论研究、国学经典整理与阐释等工作，同时也会面向社会举办一些高端的国学讲座和研修班，为国学爱好者提供深入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5. 社区国学推广机构

第一，教学模式。以社区为依托，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学普及活动，如公益读书会、道德讲堂、国学亲子班等，注重社区居民的参与和互动。第二，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以基础性和实用性为主，旨在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如国学经典诵读、传统礼仪知识讲解、家庭美德教育等。第三，师资力量。师资来源较为广泛，包括社区内的传统文化爱好者、退休教师、专业志愿者等，他们具有一定的国学知识和教学热情，但专业水平可能存在差异。第四，运营特点。多为非营利性组织，运营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资金、社区自筹资金或社会捐赠等，运营成本较低，注重社区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居民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如湖北省咸宁市国学经典诵读教育联合推广中心，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国学经典教育为宗旨，在社区内广泛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组织亲子共读、教师培训等项目，受到社区居民的广泛欢迎，有效促进了国学文化在基层社区的传播和普及。

四、当代国学教育机构发展中的现实困境检视

国学教育机构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化自信提升与政策支持的双重驱动下迎来发展机遇，2025 年我国国学教育市场规模已超 2000 亿元。然而，快速扩张背后，机构发展正遭遇多重现实困境，其深层矛盾与显性问题共同制约着国学教育的高质量传承。

1. 监管体系滞后与行业规范缺失

国学教育领域的监管缺位是当前最突出的系统性困境，政策框架的不完善与执行落地的薄弱形成了行业发展的“灰色地带”。第一，行业准入门槛形同虚设，导致市场主体良莠不齐。由于缺乏统一的办学

资质审核标准，大量缺乏专业基础的机构与个人轻易涌入市场，部分机构借助“文化传播公司”的外壳违规开展培训，仅通过简单注册营业执照便擅自开设国学课程，严重超出经营范围。这种低门槛准入直接引发恶性竞争，中研产业研究院报告明确指出，国学培训市场“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课程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影响了整体形象和声誉”。第二，监管标准的模糊性加剧了行业乱象。当前政策对国学教育的内容边界、教学规范缺乏细化界定，使得部分机构有机可乘。一些机构打着国学旗号传播“三从四德”等与现代价值观冲突的落后思想，甚至将国学与风水算命等迷信内容捆绑，通过“改命消灾”等虚假宣传实施诈骗，江苏大乾门国学堂便因包装虚假“大师”诱导付费而被警方查处。与此同时，收费监管的漏洞导致价格体系混乱，机构推出的课程从1.18万的单学科课程到10万+的VIP课程不等，定价缺乏合理依据，部分机构还通过高压销售手段强制家长付费。第三，监管协同性不足进一步削弱了治理效能。国学教育监管涉及市场监管、教育、文化等多个部门，但部门间权责划分不清、信息互通不畅，导致执法存在“真空地带”。许多机构因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消防验收合格证等法定资质而被查封，但此类查处多为突击性行动，缺乏常态化监管机制，难以从根本上净化市场环境。

2. 师资队伍建设的结构性瓶颈

师资是国学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但当前市场面临的师资短缺与质量失衡问题已成为行业发展的致命短板，供需矛盾在短期内难以缓解。第一，优质师资总量严重不足，无法匹配市场扩张需求。国学教育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极高，既需具备深厚的古典文献功底与传统文化积淀，又要掌握现代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但现实中，符合标准的教师数量极为有限，尤其在中医学、古琴、书法等细分领域，合格教师更是凤毛麟角。高校作为师资培养主阵地尚未形成有效供给，即使如郑州大学嵩阳书院等开设国学班的高校，也面临“优秀师资匮乏”的困境，且全国范围内尚未普遍设立国学本科学位，导致专业人才培养断层。第二，师资质量参差不齐，教学能力与专业资质严重脱节。为应对师资缺口，多数机构降低招聘标准，大量仅持有普通语文教师资格证甚至无相关背景的人员进入国学教学领域，其专业知识体系不完整，教学方法缺乏针对性。更严重的是，部分机构包装的“国学大师”缺乏系统学术训练，仅凭个人理解随意解读经典，甚至传播错误知识，严重误导学习者。而师资培训体系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质量危机，多数机构缺乏标准化的培训与考核机制，教师继续教育不足，难以实现专业能力提升。第三，师资认证体系的空白导致质量监管无据可依。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学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教师准入缺乏明确的专业标准，既无法对从业者进行有效筛选，也难以对教学质量进行量化评估。这种资质管理的缺位，使得“三无教师”充斥市场，成为制约国学教育专业化发展的核心障碍。

3. 课程与教材的系统性缺陷

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的不规范，直接影响国学教育的传承质量，导致文化传播出现碎片化与庸俗化倾向。第一，课程设置呈现“功利化”与“同质化”双重弊端。为迎合市场需求，许多机构刻意弱化国学经典的思想内核，将系统典籍切割为“心灵鸡汤”式的短句格言，片面追求学习的“速效性”。课程内容多集中于《千字文》《弟子规》等基础读物的诵读，缺乏对四书五经等核心典籍的深度解读，且在礼仪、茶道等实操课程中，往往重形式轻内涵，难以实现文化素养的真正提升。同时，行业内缺乏差异化竞争意识，多数机构课程结构雷同，既无法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学习者的需求，也难以体现国学教育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第二，教材建设缺乏专业规范，存在严重质量隐患。由于缺乏统一的教材审核标准，大量机构采用自编教材，这些教材往往未经学术审核，存在内容选择不当、思想偏颇等问题，甚至掺杂封建糟粕思想，严重偏离国学教育本意。教材编写的随意性导致知识传递的准确性无法保证，如部分教材对儒家“礼”的解读片面强调等级秩序，忽视其当代价值转化，造成学习者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这种

教材质量的失控状态，不仅降低了国学教育的专业性，更可能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产生负面影响。第三，课程与现代教育的融合不足，教学方法陈旧僵化。多数机构仍采用“死记硬背”的传统教学模式，缺乏互动式、游戏化等符合现代认知特点的教学设计，难以激发学习者兴趣。同时，课程内容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既未有效融入现代科技元素，也未回应社会发展需求，使得国学教育沦为脱离实际的“复古仪式”，难以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4. 商业利益与文化遗产的内在冲突

国学教育的文化属性与商业运作的盈利本质存在天然张力，当资本主导行业发展时，文化传承便容易偏离正轨，成为当前最根本的价值困境。第一，过度商业化导致教育本质的异化。部分机构将盈利作为首要目标，推行“文化搭台，利润挂帅”的运作模式，把国学教育异化为赚钱工具。为追求经济效益，这些机构不惜夸大宣传、虚假承诺，通过包装“高端国学班”“精英课程”等概念抬高收费标准，将国学教育塑造成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这种商业化运作不仅背离了国学“普惠教化”的本质，更加剧了教育不公。第二，文化传播呈现碎片化与庸俗化倾向。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国学被简化为可快速消费的文化符号，机构刻意回避经典中的复杂思想，只提取易于传播的表层元素，导致学习者无法系统把握国学精髓。更有甚者，将国学与商业营销强行捆绑，如房地产项目的“国学美学”包装、快消品的“国潮”设计等，虽扩大了国学的传播范围，却消解了其思想深度，使传统文化沦为商业炒作的噱头。第三，市场资源分布失衡加剧文化传播鸿沟。受商业利益导向影响，优质国学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这些地区线下机构占据全国65%的市场份额，且课程体系成熟完善。而在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国学教育仍处于渗透阶段，即使通过线上平台（占35%市场份额）接触国学，也多为浅层内容，难以获得系统学习体验。这种地域差距不仅限制了国学文化的广泛传播，更在不同群体间形成了文化传承的“断层”。

5. 社会认知偏差与外部环境制约

国学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成熟的社会认知基础，但当前社会对国学的理解误区与功利化心态，构成了显著的外部环境障碍。第一，家长的认知偏差导致教育需求扭曲。许多家长对国学教育的本质缺乏正确认知，将其视为提升孩子竞争力的“工具”，过分追求短期见效的培训效果，忽视了国学教育需要长期熏陶的育人规律。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直接影响机构的教学导向，迫使机构调整课程设置以迎合家长需求，如增加“国学应试”内容、强化技能训练等，进一步偏离文化传承的核心目标。第二，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引发社会争议。部分机构在教学中刻意强调“复古”，将国学与现代教育对立起来，甚至出现以“国学班”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引发社会对国学教育是否违背现代教育理念的质疑。这种认知冲突使得国学教育陷入“保守”与“进步”的争论中，既影响了社会对国学教育的接受度，也限制了机构的创新发展空间。第三，政策支持“碎片化”影响发展效能。尽管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国学教育发展，但多为原则性导向，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与配套支持措施。如在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机构扶持等关键领域，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撑体系，导致政策红利难以有效转化为行业发展动力。同时，对国学教育与义务教育的衔接缺乏明确规范，使得机构在课程设计与招生办学中面临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五、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综上，当代国学教育机构正面临监管、师资、内容、价值与认知的多重困境。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既反映了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局限，也暴露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中的深层矛盾。唯有针对性地破解这些困境，才能推动国学教育机构回归文化传承本质，实现可持续发展。

1. 健全资质监管体系，筑牢合规运营底线

资质混乱与监管空白是国学教育机构乱象的根源，需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在准入审批环节，实行分级分类许可制度。面向未成年人的收费类机构，必须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需提交课程大纲、师资资质、场地安全证明等材料，经教育部门实地核查后方可获批；成人非学历培训类机构需在营业执照中明确“国学文化培训”“传统文化咨询”等经营范围，严禁以文化传播公司名义变相开展学科类培训。同时严格执行收费监管新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3个月的费用，所有收费纳入指定银行专用账户管理，杜绝培训贷等违规模式。在动态监管方面，建立教育、市场监管、网信等多部门联合检查机制，每季度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资质有效性、收费合规性。推行阳光公示制度，要求机构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及官方平台公开许可证、师资资质、收费标准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针对各地暴露的“虚构大师”“虚假宣传”等问题，设立12345专项举报通道，一经查实即列入失信名单，依法处罚并向社会公示。

2. 规范课程内容建设，实现传统与现代适配

课程内容的科学性直接决定教育质量，需建立标准化与创新性兼具的内容体系。首先划定内容红线与框架，由教育部门联合高校国学研究机构出台《国学教育课程指导目录》，明确核心内容包括经典诵读、传统礼仪、非遗技艺等，严禁将占卜命理、风水迷信等纳入教学。要求机构选用权威教材，自编教材需经专家委员会审核备案，确保内容符合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代价值观。推动课程创新转化，鼓励开发“国学+跨学科”融合课程，如将“修身立德”理念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用“天人合一”思想补充环境教育。构建“理论+实践”教学模式，结合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开展经典诵读、民俗体验等活动，增强教育感染力。建立内容动态审核机制，每半年组织专家对机构课程进行抽样检查，对存在内容失真的机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吊销办学资质。

3.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育人能力

优质师资是国学教育的核心保障，需构建系统化培养与管理机制。建立分层培养体系，将国学教师纳入“国培计划”紧缺领域培训，开展典籍研读、文化阐释、现代教学法等专项培训。推行“双导师制”，由高校学者担任学术导师，非遗传承人担任实践导师，通过工作坊、教研会等形式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明确师资准入标准，要求国学教师需具备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职业资格证书，如书法教学需持有专业等级证书，无资质者一律不得任教。完善师资管理机制，要求机构建立教师档案，详细记录资质证明、培训经历、教学评价等信息，纳入行业数据库统一管理。推行师资信息公示制度，公开教师学历背景、教学经历，杜绝“包装大师”等虚假行为。建立考核退出机制，每年结合学员评价、教学成果进行综合考核，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解聘，对资质造假者实行行业禁入。

4. 规范营销传播行为，营造诚信发展生态

营销失范严重破坏行业信誉，需通过制度约束引导机构回归教育本质。明确营销行为准则，严禁以“免费公益课”为噱头进行诱导式营销，禁止使用“改命消灾”“命运感应”等虚假话术。要求宣传材料如实标注课程形式、时长、效果，不得将录播课伪称为直播课，签订规范服务合同明确退费政策，避免隐形消费。强化全渠道监管，联合网信部门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的国学培训宣传实行关键词筛查，下架含有迷信内容、虚假承诺的信息。建立行业诚信档案，记录机构营销违规情况，与资质年检、政策扶持挂钩，对诚信经营的机构给予评优推荐、资源倾斜等激励，对多次违规的列入重点监管名单。

5.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引导机构良性发展

科学评价是机构发展的“指挥棒”，需建立多方参与的综合评价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合规性评价，

重点考核资质齐全度、内容合规性、师资达标率等硬性指标,评价结果作为资质年检、政策支持的核心依据。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质量评估,从课程科学性、教学效果、学员满意度等维度进行打分,评估结果通过政务平台向社会公示,为公众选择提供参考。推动机构自我评估与社会监督,要求机构每年开展教学质量自查,公开自查报告,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鼓励家长、学员参与评价,通过线上问卷、座谈会等形式收集意见,将评价结果与课程优化、师资调整直接挂钩,形成“评价—改进—提升”的良性循环。支持行业协会开展评优活动,表彰合规经营、质量优良的机构,树立行业标杆。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邢海燕. 国学教育发展困境突围[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19, (04): 95-103.
- [2] 王熙, 苏尚锋, 曹婷婷. 从国学之“国”看国学教育的当代价值[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04): 30-37.
- [3] 毛新青. 当代国学教育的价值、原则及实践路径[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3(01): 1-5.
- [4] 李银姬. 小学情境国学校本课程设计与实施研究[D]. 深圳大学, 2018.
- [5] 田立君, 陈旭远. 小学国学校本课程设计与开发的价值取向分析[J].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3, (01): 16-20.
- [6] 田立君, 董兰, 陈旭远. 小学国学校本课程目标与内容设计——基于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长甸小学的行动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03): 158-162.
- [7] 银秋霞. 中学国学教育实践研究——以南昌市E中学为例[D]. 江西农业大学, 2022.
- [8] 王声平, 曹柳坤. 幼儿园国学经典教育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以湖南省A幼儿园为考察对象[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8, 32(07): 61-66+128.
- [9] 王启北, 徐晓杰. 信息化背景下国学培训机构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发展趋势[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20, 23(05): 213-214.
- [10] 赵涵. “伪国学”教育机构之违法性探究——以“女德班”事件为例[J]. 新西部, 2019, (21): 101-102.